

立宪主义与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

张继良 褚江丽 叶立周 ◎ 著

CONSTITUTIONALISM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MODER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立宪主义与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

张继良 褚江丽 叶立周 ◎ 著

CONSTITUTIONALISM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MODER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宪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 / 张继良, 褚江丽, 叶立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161 - 9870 - 4

I. ①立… II. ①张…②褚…③叶… III. ①宪法 - 研究②政治改革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D911. 04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136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75
插 页 2
字 数 440 千字
定 价 115.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12JHQ060)

序 言

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这不仅因为当代中国是由近代中国发展而来的，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都不像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变革那样改变了国家政治社会传统。在自身传统发展基础上、受西方文化影响发生的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与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相比较所呈现出来的“变”与“不变”，以及没有使中国实现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国人民离过上现代政治社会生活仍很遥远的现实，足以引起每个现代人的深思和继续检讨。有人或许会说，你这是在责难历史、苛求古人！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并不否认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每一代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关系当中，他们只能做历史允许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不过，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每个时代都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或者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富强，或者为了改变国家命运、实现民族复兴，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和政治发展道路，比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人遭受了更多灾难，作出了更多牺牲。近代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他们为了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社会现实，不辞艰辛，上下求索，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是这些人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他们有的主张建立“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有的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有的则主张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他们解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问题的政治方案虽然不同，但目的都是构建合乎正义原则的理想的国家和社会生活模式，而且他们在设计未来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时候，都深入探讨了如何构建公正、和谐的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发生，与西方政治文明的输入和影响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起因却是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所以，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价值取向与着力于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西方宪政文明有着显著差

异。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是构建资产阶级掌控国家权力的民主宪政，他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是实现、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发动者、参与者，其出身背景十分复杂，政治态度迥然不同，既有传统士大夫阶层，又有新兴资产阶级，还有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代表及各种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群众，他们的社会出身不同、文化素养不同、政治信念不同，在政治诉求上存在明显差异。近代西方宪政改革的领导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配置、运作资产阶级国家权力，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资产阶级自由和权利问题；而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发动者和参与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由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掌握国家权力问题。所以，西方资产阶级在设计他们所追求的价值体系时，既注意到了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有效运作，又注意到了如何预防国家权力被政府滥用，并为在宪政架构内实现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利益扩张预留了空间；而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由于受到诸多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及影响，各社会主体的政治稳定性较差，时常被新产生的政治实体所取代，他们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体系，往往缺乏长远的、缜密的、科学的、合理的理论构思和具体实施方案，所以，不免陷于应付时局变化而缺乏切实可行的长远战略，以达到引领社会历史潮流的被动状态。如此一来，有些社会阶层的政治主张和诉求，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很快就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有的则处于被动的守护既得利益的慌乱之中，他们所提倡或建立的政治体制，时常受到滑向传统的个人专制的威胁。戊戌变法的失败、晚清宪政改革的夭折、资产阶级革命的挫折、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蜕变，都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由于中国缺乏下层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经验，新生人民政权的领导者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构想和设计，尚存在短期难以克服的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在切实保障人民有效履行民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方面远未达到预期。这也就是近代历史在形式上虽然已经终结，但被宣布破产的近代一些政治派别选择的“政治道路”，尤其是“中间道路”，即使在当今仍然没有被一些人所抛弃，而作为历史必然选择的政治道路，因为没有全面充分地展现其优越性，不断受到中外反对势力的攻击而不得不继续探索，并经受着历史考验。

显然，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及各政治派别对政治道路和政体问题的探讨，比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宪政实践受到了更多的局限，这些局限虽然被

后人归结为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如果加以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后人看待历史问题的这种历史观本身并不是理性的，至少存在着将生动的复杂的历史问题抽象化、简单化和模式化的缺陷。而把近代中国不同阶级或政治集团主导的政治变革的局限性，细化为利益局限性、思想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制度局限性、社会环境等多种更加复杂、更加具体的局限性，比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所遭受的挫折，笼统地归结为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更有利于真实地反映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本质和规律，更有利于深化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和解决。

眼前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除了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过程、内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客观论述和深入分析之外，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凸显了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研究所具有的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该著不仅强调从政治变革的发动者、参与者的阶级局限性和个性缺失相统一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成败得失，而且为了写出一部令人信服的真实的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史，深刻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客观历史经验和教训，达到以史为鉴、服务现实、开拓未来的目的，笔者运用了对比分析的写作手法，对近代中外政治理念、政治变革过程和后果的差异性，以及对导致这些差异性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其他客观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探讨。与以往的有关研究成果注重描述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过程及其效果不同，该著作把注意力和重点用在了考察和分析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过程及其后果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上，这对于帮助人们加深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艰难性、曲折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帮助人们摆脱传统因素对于推进社会政治变革的困扰，无疑是更加有益的。基于对本书以上价值和特点的考虑，应笔者之约，特奉献以上文字，是为序。

季正聚*

2016年8月30日

* 序言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导论	(1)
一、写作目的	(4)
二、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11)
三、研究方法	(22)
第一章 立宪主义的概念、内容与价值	(23)
第一节 立宪主义的概念	(23)
一、宪法的含义	(24)
二、立宪主义的界定	(27)
三、宪法与立宪主义的关系	(30)
第二节 立宪主义的内容	(33)
一、立宪主义理论	(34)
二、立宪主义实践	(38)
三、立宪主义制度	(43)
第三节 立宪主义的价值	(58)
一、价值与法律价值	(58)
二、立宪主义价值的内涵	(60)
三、立宪主义的基本价值	(63)
第二章 立宪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71)
第一节 传播的动因	(71)
一、晚清时局的变化	(72)
二、立宪救国思潮的兴起	(74)
三、对西方宪政文明的向往	(78)
第二节 传播的过程和内容	(82)
一、对宪政制度的初步介绍	(83)
二、立宪主义理论的传播	(87)
第三节 立宪主义的演化	(102)
一、演化的原因	(102)

二、演化的表现	(108)
三、演化的后果	(112)
第三章 中央政府主导的立宪	(115)
第一节 清政府的立宪	(115)
一、清政府的立宪动机	(116)
二、清政府的立宪过程	(121)
三、清政府立宪的历史反思	(125)
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立宪	(127)
一、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制宪历程	(127)
二、“后袁时代”军阀的立宪历程	(130)
三、北洋政府的立宪评析	(138)
第三节 国民政府的立宪	(141)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扭曲	(142)
二、维护“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的立宪闹剧	(149)
第四章 资产阶级立宪理论与实践	(163)
第一节 革命派的立宪理论与实践	(163)
一、民主权利意识	(164)
二、三民主义	(167)
三、宪政制度设计	(171)
四、立宪实践	(174)
第二节 人权派的诉求与抗争	(182)
一、揭露与抗争	(183)
二、人权观念	(185)
三、国家功用	(188)
四、法治价值	(190)
五、人权运动的终结与评价	(193)
第三节 中间路线的形成与失败	(195)
一、中间路线的形成及特征	(195)
二、中间路线的失败及其评价	(203)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构建	(208)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	(208)
一、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	(208)
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内容	(211)

三、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特质	(217)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宪政实践	(221)
一、宪法性文件的颁布	(221)
二、选举法的制定实施	(232)
三、人权立法与人权保障	(241)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宪政制度	(248)
一、苏维埃制度	(248)
二、参议会制度	(254)
三、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259)
四、新民主主义宪政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转变	(267)
第六章 近代中外立宪政治比较	(273)
第一节 实行立宪政治的基础比较	(273)
一、实行立宪政治的经济基础不同	(274)
二、实行立宪政治的政治基础不同	(280)
三、实行立宪政治的思想基础不同	(283)
四、实行立宪政治的社会基础不同	(294)
第二节 近代中外立宪目的与价值取向比较	(305)
一、西方国家的立宪目的及价值取向	(306)
二、中国不同时期的立宪目的及价值取向	(318)
第三节 近代中外立宪主体与宪政进程关系比较	(350)
一、近代西方立宪主体与宪政进程的关系	(350)
二、近代中国立宪主体与宪政进程的关系	(385)
结语	(389)
一、构建实施民主的政治基础	(391)
二、确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改革目标	(394)
三、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及其实现形式	(397)
四、培养与现代政治生活要求相适应的理性公民	(400)
参考文献	(406)
后记	(418)

导 论

近代是中国进入全面变革（包括国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的历史时期，其中变革最为剧烈的领域当属政治领域。由于近代中国国力衰微，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外敌入侵，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治变革的起因和环境与西方国家的变革截然不同。后人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认识和研究，也常常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进行比较。很显然，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具有显著差别，而这种差别是由多方面深层原因造成的。

第一，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起因，与近代西方国家政治变革的起因不完全相同。近代中国政治变革是基于国内原因并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其中，国内因素是主因，外来因素是次因，但没有外因的刺激，内因就不会被迅速唤醒。近代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元对立的农业社会；近代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渗透之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缓慢增长，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缓慢发展和转型的趋势。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还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传统的古老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之外，又增添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既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又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复杂性、多变性、艰难性和曲折性。通过中西方国家政治变革的比较可以发现，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基本是西方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起因比较简单，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逐渐取得优势地位，驱使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以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并要求改变传统的封建专制的政府形态，从而引发了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任务比西方国家复杂和艰巨，变革的目标

和路径因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经常变化而不确定。近代中国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外交上丧失了独立性的国家，中国政治变革的任务不只是解决国家权力转移、建构符合 20 世纪发展趋势的政府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任务。由于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极不稳定、不成熟，没有任何阶级能够依靠本阶级的力量，独立地完成政治变革的历史任务，而且由于不同社会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不同，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从而增加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则不同，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变革，主要任务是解决国内问题，即反对封建专制，构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革的目标明确，任务单一。加之中世纪晚期至近代初期，多数西方国家都发展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又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上取得了优势，其政治变革普遍采取了资产阶级革命或由上而下的政治改良的方式，不仅最终取得了成功，而且比中国政治变革进行得顺利。

第三，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比西方国家复杂，政治变革的思想阻力远远大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比较稳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化结构的稳定性都无法比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比其他国家封建社会漫长的文化根源。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各种小资产阶级文化输入中国并逐渐传播，在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文化互相交织、互相碰撞、互相渗透、鱼龙混杂的局面。资本主义文化虽然在世界上表现出优势，甚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以后所追求和向往的生活方式，但始终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激烈对抗的首先是本土文化，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次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它所张扬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很快被广大民众所了解和接受，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外文化在近代中国汇集之后，虽然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矛盾，但它们之间也相互渗透和吸收，尤其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因素的吸收，对外国文化的合理因素的积极借鉴和吸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然而，不同文化毕竟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各种文化体系之间的价值冲突，以及近代中国人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清理、认识和选择，更多地受到了工具理性的影响，不能很好地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导致中国不同文化

受体对中国政治变革及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主张存在着严重抵牾，中国政治变革来自文化领域的阻力及现代文化体系建构的缺失的影响，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文化对本国政治变革的影响，而且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中，任何一种文化都难以在文化领域取得绝对优势，从而助长了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则不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扩张，资产阶级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优势地位，资产阶级凭借自己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强行推进宪政改革，而且能够比较容易地冲破各种阻力，按照资产阶级的诉愿，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国家。

第四，以上三个因素及其不同的结合方式，造成了近代中西方政治变革的过程和后果之间的巨大差异。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起因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内部的变化，有经济力量强大、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熟的资产阶级领导，有资产阶级文化氛围的有力配合与支持，并且推进政治变革的各种因素形成了合力和正向效应。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则表现为，政治变革不是完全起因于国内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外部因素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政治变革的目标不能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形成共识，而是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发生转变；文化领域的斗争和矛盾异常复杂和激烈，缺乏政治上成熟和一贯的阶级力量对政治变革的持续推动。所以，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任务难以完成，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尤其艰难和漫长，并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留下了许多隐忧和难题。

近代历史在一天一天的远离我们，而由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任务没有彻底完成，中国人民虽然从时间维度上看，已经走进了现代，但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来看，有许多工作仍属于近代没有完成的事业。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改革，迅速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变革，从建立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甚至法治政党，进而培养实行法治所必需的法律文化和道德文明的要求来看，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太多工作要做，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一百多年来的实践来看，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彻底清除封建遗毒，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建立公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比发展经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尤其政治体制变革，直接涉及当政者或既得利益阶层的特权，所遭遇的阻力和抵制更加难以想象。中国历史上多数变法革新失败的教训表明，统治阶级对

权力的垄断、既得利益格局的固化等因素对变革的阻碍，是形成中国传统政治惰性，严重阻塞各社会阶层流动，妨碍构建社会公正和良好政治秩序，导致周而复始地采用以暴易暴方式压制社会矛盾，而不是通过政治改革解决社会矛盾、扩大民众政治参与，以避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

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屡屡受挫，专制政治难以铲除，民权政治不能建立，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被少数人所垄断，广大民众不能合理地分享。所以，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近代历史留给后人的主要不是惠及他们的文明进步的福祉，还有许多困扰着政治文明、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难题等待后人解决。正是近代政治变革的诸多缺憾，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善待中国近代这段极不平凡的历史，否则，我们可能会再次失去振兴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再次延缓近代中国人民开始追求，至今仍未实现的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梦。

一、写作目的

撰写本书的目的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关系，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引进立宪主义，把其作为改造中国传统政治的工具的原因及清末以来各种政治势力推行宪政改革的目的，研究立宪主义价值理念与近代中国政治现实的脱节、冲突等因素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复杂影响，澄清学术界关于立宪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二者关系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消除这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而通过确认以下历史事实，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当中吸取营养元素，为继续深入探索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哲学、政治道路、政治制度及其实践模式提供借鉴。

第一，政治变革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其首要目的是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自由幸福，这一主题集中展现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价值诉愿和政治愿景。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掌控世界话语权、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各社会阶级及其政治集团的政治变革方案，不同程度地引入或涉及了立宪主义因素。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毛

泽东认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①，资产阶级中间派代表人物周鲸文把“人民争人权，国家争国权”^②视为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从宪政改革的视角来看，他们的主张都内含着立宪主义元素，但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过程和民生诉求的实际效果来看，各阶级依次主导的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并不是在立宪主义轨道上运行的。所以，弄清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起因、性质、特点、过程和效果，从多维度对其进行审视和深入研究，对于准确把握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规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其服务于当今的政治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近代政治史、近代宪政史的不少著作和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不少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从还原历史、适应和满足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在立意、史实描述、价值评判、实际效果等方面尚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对近代中国立宪运动失败的历史原因、近代历史主题和政治嬗递规律的判断、把握上，与客观历史事实存在一定出入；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实践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尤其对近代军阀政治扭曲、破坏宪政的历史效应的认识，研究得不够深入，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对于近代宪政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及新生政治事物成功需要反复实践的曲折性的认识，流于表面，估计不足；对于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宪政思想的研究带有片面性，没有把对他们的思想研究和解读他们的著述、探究他们的全部理论活动结合起来；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立宪活动、近代各个时期制定的宪法性文本的研究，缺乏客观、真实反映其历史全貌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等等。因此，有许多涉及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问题亟须深入研究，并在全面把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获得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新认识、新观念、新结论。

第三，在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价值评判、历史思维和研究方法上，理论界、学术界的认识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或囿于狭隘的民族文化本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或盲目推崇西方政治文化，从西方文化视角观察中国政治变革；或从抽象原则及个人偏好出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页。

② 周鲸文：《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时代批评》1947年第4卷第86期。

曲解立宪主义及其在近代中国传播、演变、遭受挫折的事实及原因,缺乏历史视野、世界视野、民众视野和开放情怀,忽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国民性格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与实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巨大反差,无法科学、准确地评价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或者虽然看到了立宪主义产生的西方社会基础、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中国相关因素的异质性,认识到这种差异性是导致中西方近代立宪运动遭受不同命运的主要原因,但又僵化地、片面地以中西方时代差异和文化差异为借口,否定西方近代政治文明较之中国封建政治文明的进步性,否定中国学习西方、发动立宪运动的合理性因素。同时,无视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趋势,看不到中国传统文明已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趋势,不适当地夸大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中国政治变革的目标、任务、道路和路径选择的制约,把近代中国政治变革遭受挫折的根源完全归结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取消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基础。事实上,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不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因素的特殊性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等综合因素决定的,即近代中国人与西方人生活环境的殊异性及在两种环境中形成的不同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才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变革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深层原因。

就立宪主义而言,实质上,它只是一种产生于西方而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所以,没有必要对它产生过分的反应。近代以来,它之所以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主要缘于西方宪政国家都是世界强国,缘于民主宪政比专制政治具有进步性这一事实,至于立宪主义能否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和种种罪恶,能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能否造福于人民,并不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紧迫问题。在近代,立宪主义是在工具理性驱使下被引入中国的,并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得到了传播和运用。因此,当时人们对于西方宪政价值的考量,主要不是从构建民主政体和民主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坚持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借鉴和吸收西方宪政文明的合理因素的同时,努力克服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虚伪性、私利性,以便使西方宪政文明的合理性因素更好地和本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并在弘扬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而是以带有合理性的功利

主义态度看待立宪主义、运用立宪主义，这种合理性的依据就是立宪救国。所以，评价中国近代立宪运动，应该从立宪主义价值的多样性及其适应解决中国近代历史主题的角度来考量，从而避免笼统地、盲目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西方宪政文明。

在世界政治文明进程中，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对比存在很大差异，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背景和起点不同，不可能采用完全相同的立宪政体，非西方国家尤其封建传统比较深厚的东方国家，实施民主宪法或民主政治的阻力更大，应该更加认真考量选择何种立宪政体、采用何种民主形式，才更加符合本国国情和本民族文化的特点。西方立宪政体的形成、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完善，是建立在西方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之上的，它在西方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主要是资产阶级垄断、控制了经济的和社会的主要资源，并适应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宪政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而近代中国的立宪主义者，要求在完全不同于西方国情和社会环境的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不仅缺乏阶级基础，而且缺乏文化支撑。

清末民初发生的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欧美资产阶级宪政的立宪运动之所以先后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实行资产阶级宪政的阶级力量、社会力量、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也就是宪政尚不是当时的多数中国人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生活，不仅封建统治集团不肯真正实施宪政，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施宪政，广大民众也对宪政文明没有认同感。没有走出传统国度的近代中国，急于学习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验，移植西方先进的政治事务，因而出现了宪政改革与社会发展阶段错位、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冲突，下层民众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对抗，多数人民对于宪政改革，如隔岸观火，茫然不为其所动。由此可见，任何一场真正的政治变革，如果失去民众的认知和广泛参与，自然难以取得成功。

清朝末年，迫于挽救政治危机的压力，清政府摒弃立宪主义精神，选择君主立宪途径，有限度地改造君主政治，达到“皇权永固”的目的，最终没有逃脱覆灭的厄运。但清政府的制宪和立法活动，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这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清王朝所做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清王朝被推翻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模仿西方宪政模式，试图建立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最终也由于自身不具备推行宪政的条件，缺乏民众认同和支持等原因而归于失败。